



清华 社会学评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No.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五辑

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



执行主编◎郭于华

清华社会学评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



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



执行主编◎郭于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5辑/郭于华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097-3222-9

I. ①清… II. ①郭…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4289 号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五辑)

主 办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执行主编 / 郭于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闻 翔 罗秋实 刘德顺

责任校对 / 李 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222-9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7.75

字 数 / 31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专题：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

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	郭于华	1
两种环保小世界：社会转型期中的民间环保组织	晋 军	22
欠薪体制与建筑工的分化		
——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民族志	元 昕	46
公共事件的制造		
——B市茉莉园小区业主诉讼维权的民族志文本	孙湛宁	74
底层生产的实践逻辑及其固化机制		
——中国城市“新失业群体”的一份文化民族志	吕 鹏	99

转 型 争 论

新古典社会学：从共产主义的终结到阶级的终结	麦克·布洛维	113
后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与新古典社会学对历史的		
反讽视角	吉尔·伊亚尔 伊万·塞勒尼 艾莉诺·汤斯利	135

144	关于诸转型的一种理论	伊万·塞勒尼
155	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 问题、理论与方法	沈 原 闻 翔
174	“权利”还是“权力”? ——劳工 NGO 维权策略与机制的个案研究	吕佳龄
194	迈向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威尔福瑞德·斯彭
211	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女工民主工会运动为中心	金 元
244	奢靡消费与商业合作 ——温州草根商人群体的“街角青年”化	郭宇宽
255	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教育需求的变化	布迪厄 波特斯基

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 民族志的洞察力

郭于华*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的世界中。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伊亚尔和塞勒尼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发生是向社会学家发出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Eyal et al., 1998）这些被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他同样认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 693）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论是“邀请”还是“挑战”，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改革以及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呈现于我们面前。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作者同时也是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研究员。

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且“有趣”的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学科知识的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承担最大代价的人?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是在一种资源高度垄断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为“另一种现代性”,走上独特的转型路径;具有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孙立平,2008)。相对于塞勒尼和斯达克等所关注的苏东市场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这种独特性可以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关系,如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行使与制度变通;又如与显规则(作为文本的制度)相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常常是“潜规则”(吴思,2001)。这些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需要进行实践社会学的探索,从而对社会转型的过程、逻辑、机制和普通人在其中所使用的技术与策略做出解释。而完成这一任务或使命迫切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対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与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

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米尔斯，1995）。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会产生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面对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凸显、权力失控、总体性精英形成、底层碎片化和失语等社会诸象之时，主流的社会学界，要么无视这些问题，专心致志地营造自己的宏大理论；要么是用一种过密化的专业分工方式将问题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沦为布迪厄所指斥的名为“科学研究”实为“社会巫术”的社会调查存在。在研究实际中，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绝无仅有。在米尔斯的杰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在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

让我们再次重温和延展这一重要的心智品质：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性变迁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他们无法了解这个时代对他们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因而人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这种能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以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梭，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

其一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意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

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能力与洞察能力。强调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即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

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条件。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也是社会记忆的能力，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的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米尔斯，1995）。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60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意志的能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同属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同样需要面对上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要命”而“有趣”的问题，然而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似乎更为突显。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之一的民族志，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似乎更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而且相对于社会学的类似局限似乎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短板”。其具体表现有：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建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是通过对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描述建构

理论的过程，其方法论核心在于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典范的“以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鉴于上述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与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局限，我认为有必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亦即以同样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运用人类学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承担起破解和分析社会转型，进而解释和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将求知的好奇、破解谜题的乐趣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生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不幸，但我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种幸运，是生逢其时，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宝库。总之，社会科学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民族志的宏观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经常受到相关学科的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经常专注于各类小型社会，诸如族群、部落、社区或某类小共同体，对本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小传统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却少有宏观视野和理论关怀，因而至多只能展示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中的一个或几个片断，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就学术的普遍意义而言“没有代表性”。

若要使民族志研究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局限，我们立刻会想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我们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观视野，就是强调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微观社会和文化细节的描述。以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人之一的马凌诺斯基为例，他的奠基之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微观材料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可接受

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些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马凌诺斯基，2002：前言2）。对于“库拉”交易的研究，要把整个制度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让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此外，研究者还要将所见所想传递给同行考察，因而对经验材料要进行概化（generalization），提升为理论；而且“库拉”所代表的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态，可以期待在不同的民族志地区找到有关或类似的现象。不仅如此，马凌诺斯基还进一步指出，从当地人的视角得到所描述事物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构成其文化独特的体验生命和世界的角度，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知识和视野，加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从而使人类学能够“以它最细致和深邃的形态，在理解其他人类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马凌诺斯基，2002：441~447）。马凌诺斯基的整体文化论，从民族志的开端时期就确立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宏观视野及其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注。

在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其先驱者、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倡导“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吴文藻，1935）。在吴文藻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將小地方（社区）与大社会（中国）加以贯通的明确意识。其后，先后师从于吴文藻和马凌诺斯基的费孝通更是将“社区研究”推进到方法论、结构功能分析、应用人类学等宏观层面，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及后来的《乡土中国》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都“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社区”而“了解中国社会”。

前辈们所开创的“社区研究”传统，坚持经验性的社区民族志方法，同时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多重时空贯通的观点，从而形成带有强烈的“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王铭铭，1997：56~61）。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学术复兴的新时期，王铭铭在“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制度史”的叙述框架中同时展示“社区的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历程，将结构功能视角和历史过

程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在历史的纵深方向上来看社区的结构功能；从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角度探讨社区的历史和变迁。这种努力也同样是建构“小地方”与“大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联系的有益探索（王铭铭，1997：20～110；郭于华，1997：122～126）。

超越本土社会和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建立“社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研究中引入权力关系和政治视角，即关注民众生活、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当今的一些民族志作品，时常将所研究的“本土”（the local）——族群、社区或村落——描述成远离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那里或者民情醇厚、风俗奇特，或者有着某种神秘古怪的文化、习俗、组织和制度的“原生态”，似乎从未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关系。这类民族志作品难免给人以“猎奇”、“搜神”之感。殊不知，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被称为“地球村”的现代/后现代世界中已经无奇可猎；而且，在同样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例如，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关联。由此，人们会怀疑是否存在上述民族志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族群或社区，也会质疑单纯描述这样的一方本土究竟意义何在。

着眼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的洞察力，是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它能够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使文化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Geertz，1973：3-30）具有能够将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意义、机制和逻辑“连根拔起”的力量，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具备这种洞察力，研究者无论研究什么对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都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指出的：研究地点并不等同于研究对象；所谓“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他们是在村庄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they study in villages）（Geertz，1973：22），正是强调民族志在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中做研究但并非只研究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本身，而是有着更宏大的、关系性的视野并提出结构性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与宏观结构分析之间、小地方与大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 民族志的历史向度

如前所述，社会学的想象力应包含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是传统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三者的叠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诸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既是我们的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也构成巨大的学术挑战，因为若不能洞悉整个的历史过程和逻辑，也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探讨今日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可以具体体现为口述历史研究与“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指出，长期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直存在如布罗代尔所言的“聋子之间的对话”的状态——它们被各自的学科范式训练或“社会化”，因而操着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的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社会学家被训练得着重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心具体细节。双方也因此而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历史学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地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伯克，2001：2~15）。

这种学科之间相互隔膜和攻讦的状况随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发展而有所改观，这种发展表现为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社会理论家的“历史转向”，而口述历史研究恰可成为在这两端建立起的桥梁。

自法国年鉴派史学崛起后，传统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存在状态就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占据主流位置的官方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精英史并不是全面的（整体的）历史，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诸如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与传统的主流的历史存在形式——书写的历史相对的是口述历史形式，这种形式经常不存在或者只是边缘地、卑微地存在着。而没有这一维度的存在，历史就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由以往的历史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字的历史还是口述的历史，书写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而且是权力主导和支配下的建构。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做出的“谁

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陈述，至今依然是历史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权力属性。

保罗·汤普逊毫不讳言：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战，部分是由于它与历史的这种基本目的有所关联。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历史证据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汤普逊，1999：1~18）。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口述史是围绕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汤普逊，1999：18）。就实践来说，人民在重新创造过去的过程中也重新经历了历史。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汤普逊，1999：247）。

在面对普通人讲述的他们的生活经历时，我们需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成民族志的洞察力。这一向度的追求旨在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事人讲述的记录和研究，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这同样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细致描述与理论建构之间进行贯通的能力。

对普通人历史的记录和分析除了学术的内在本质与社会承担方面的意义外，还有着社会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和实践意义。正如布迪厄等在其“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通过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故事，在个体命运和制度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从而突破了所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虚假对立（Bourdieu，1999）。建立在普通人生活史基础上的访谈文本，正像该书的英译者所言恰如一篇篇小民族志。而研究者与被访者密切互动和深入访谈的方法原本就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看家本事。该研究除了在个体苦难的“社会性”上给予我们思考上的启发之外，其研究的方法论主张也在以问题为中心，打通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关系方面给人以重要启示。

在这里需要提到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ethnographic interview），以往研究者通常会认为“所见”的信度高于“所闻”；但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在实地调查中，“眼见为实”并不全然

和总是有效。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例如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带到他与官员密谈的餐桌上去，更不用说带到某些特别的消费场所去，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换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故事”（Liu, 2002: ix - xiv）。此外，人类学者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观察所见，他需要聆听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需要知道对当地人而言什么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性的，民族志调查从所见到所闻的强调、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缘于上述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民族志描写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实际经历转向对他们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释。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Liu, 2002: ix - xiv）。进而这种转变也带来方法论上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对于解释的解释。故事的讲述和解释也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旨趣，由此民族志表述与口述史的内在关联和一致得以呈现，而呈现方式则是实验性的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米尔斯，1995）民族志不仅是对一地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描述报告，更应该是对其社会与文化结构及其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关系的分析与解释。从一个更具方法论意义的角度而言，过程与结构的关系亦是民族志的历史洞察力所关注的，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于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弱点也十分明显：过于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而对社会—文化过程和历史的独特性漠不关心；过分强调社会的一体化，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多样性加以删除；过分强调制度的结构性和共时性意义，而忽视制度形成的历史和行动者创造历史、改变结构的能力。由此，对过程的强调是民族志历史向度的另一重要方面，这与孙立平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具有同样的涵义。“过程—事件分析”强调研究要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将社会事实看做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提倡这样一种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并揭示其中的逻辑。在对乡村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就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做一种实践形态，通过观察分析人们的社会行动，呈现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

程，洞察那些“微妙的”在实际运作中起作用的机制、逻辑和意义（孙立平，2000）。

以“三提五统”取消之前农村定购粮收购研究为例，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定购粮的征收这样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是收粮的过程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本来在国家正式权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以及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是如何现实地行使和运作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权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如果不能关注这种在动态的事件中才能凸现出来的因素，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简单的和僵硬的层次上。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和逻辑在各种力量与要素中、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中常常是无法见到的，唯有在过程中体现甚至生成（孙立平，2000；孙立平、郭于华，2000）。

民族志对于历史与过程的洞察力，可以将个体经历与更大的社会变迁连接起来，可以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志有了历史的视角和维度，可以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立场的局限，面对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人类学研究经常因缺少历史感而受到质疑和攻讦，其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也的确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显得软弱乏力，更难以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剧变过程。这些缺憾可以经由口述史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当然还应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加入而得以弥补，普通人的讲述从而成为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反之，在民众口述资料的搜集研究过程中，人类学深入扎实的田野作业基本功、民族志的“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交流与互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件，口述历史的工作任务也难以完成。民族志与口述历史方法的结合对以往各自的研究局限都将有所突破，对学科的发展也是相得益彰。

三 民族志的理论抱负

不知始于何时，民族志作品或者人类学研究被认为单纯进行文化对象的

描述就够了，这种描述应该细致而深入，但却不必生产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在研究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大量以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可以描述得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甚至活色生香，但却不明了研究者究竟要做什么，要面对什么问题。对于民族志描述的这类认识真可谓对作为科学的人类学的莫大误识。

其实自其诞生时代起人类学就以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建树为己任，马凌诺斯基曾明确指出：“对人类学者而言，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虽然对研究者而言，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拟议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赖理论的激励，他可能同时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工作者。”（马凌诺斯基，2002：6~7）建构理论的抱负和努力自现代的科学的人类学产生之始到当今时代，在人类学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直未曾中断。当我们今天学习、总结人类学的学科史、学术流派、学术大师、理论和方法时，依然使用理论的源流和脉络，而且只能依循理论的源流和脉络：从古典时期的进化论、传播论，经现代的功能主义、历史特殊主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等，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更为多元并存的“写文化”、“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与反思人类学等后现代人类学思想，人们所概括出来的种种“范式”都是理论的范式。就此而言，民族志如若不生产理论，这些“学说”和“主义”难道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民族志的理论抱负还可从诸位理论大师的贡献中体现出来——他们都有意识地承担起创构理论的使命：无论是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格尔茨、布迪厄、萨林斯等，无一不是从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走向社会科学理论大家的位置。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影响甚至已经不限于人类学领域，而是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以麦克·布洛维关于“扩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的倡导和讨论为例，可以看到研究者在实践中推进民族志理论生产的努力。在作为方法论的扩展个案法的论述中，布洛维首先指出：扩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布洛维，2007：79~80）。“扩展”始于